

简析墨子荒政说的宗教属性与人文价值

路学军

(平顶山学院 伏牛山文化圈研究中心)

[摘要] 在先秦思想家中，墨子荒政思想颇为系统，对于灾荒成因、备荒策略、救荒举措等方面皆有阐发。墨子在论及灾荒成因时，虽不否认有“天”等超自然因素的影响，但更强调灾害产生与人为因素间的密切关联。关于备荒，墨子从自己对灾荒成因的认识出发，重视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方面手段的阐发和运用。墨子对于救荒也有较多阐述，特别是将兼爱、平等、非命思想注入其中而显得尤为令人瞩目。总之，墨子荒政思想颇有独到之处，其价值颇值得深入挖掘。

[关键词] 墨子； 灾荒； 荒政

[作者简介] 路学军，男，平顶山学院伏牛山文化圈研究中心，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，历史学博士，邮箱：lxjssd@163.com。手机：13525393104

先秦时期，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灾荒频繁发生，作为春秋战国之际杰出的思想家，墨子对于灾荒成因、备荒策略、救荒举措等方面皆有阐发，其荒政思想颇有独到之处。关于墨子的荒政学说，学界历来关注较少，特别是尚无专论探讨，有鉴于此，本文即以此为研究对象，以厘清其基本脉络，并求教于方家。

一、墨子对灾荒成因的认识

春秋战国之际，面对频频发生各种灾荒的成因，墨子颇为关注。由对灾荒成因的解释出发，墨子探究应对之道，进而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荒政学说，因此研讨墨子的灾荒成因理念是分析其荒政思想的重要起点。

1、天志与灾荒形成

先秦时期，灾荒常有发生，对其成因的解释也多有差异，而在这里面，天命致灾观念是其中的主流。如《诗经·云汉》载：“天降丧乱。饥馑荐臻。”又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载春秋时计然之言：“故岁在金，穰；水，毁；木，饥；火，旱。”“六岁穰，六岁旱，十二岁一大饥。”都反映了当时人们所具有上天左右灾患的观念，以及由此产生对天的敬畏之情，可谓颇具典型性。

众所周知，墨子是有神论者，其学说中亦有“天志”、“明鬼”之论，即承认神明的存在。故而在论及灾荒成因时，墨子并不否认有“天”等超自然因素的影响，如墨子在面对灾荒的发生时即强调“天意不可不慎也”，认为“五谷不孰，六畜不遂，疾菑戾疫、飘风苦雨，荐臻而至者，此天之降罚也”。由此可见，墨子也认为灾荒发生与否，天意的取向是其重要原因。

从表面看来，墨子这种思想与当时流行的天命观念颇有契合之处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墨子所言的“天”虽然具有人格神的某些特征，但并非是直接左右世间万物的主宰。实际上，在更大程度上墨子将“天”视为一种理想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。如墨子即言：“我有天志，譬若轮人之有规，匠人之有矩，轮匠执其规矩，以度天下之方圜。”再如墨子也曾言“天欲义而恶不义”，“天之行

广而无私，其施厚而不德，其明久而不衰，”在墨子那里，所谓的“天”实际上是一个至大至公的道德标准，它“行广而无私”、“明久而不衰”，为世间树立了一个行为标准，其代表的形象也正是墨子心目中正义的化身。

不仅如此，墨子从“天志”说出发还衍生出“非命”的思想。墨子认为，“天”虽然至高无上，但其发挥作用主要还是依赖于人为因素。在这里，墨子否定了有预见的、不可改变的命，彻底否定了“命定论”。如墨子就说：“命者，暴王所作，穷人所术，非仁者之言也。今之为仁义者，将不可不察而强非者，此也。”称天因爱民的缘故而设置王公侯伯，“使之赏贤而罚暴”。从“非命”论出发，墨子对事物评价又衍生出了三表法认识论，即对人们行为处事的评价要“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”，“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”，还要“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”。可见，墨子强调在神明的观照之下，人们行为决定自己的命运，而只有戮力向善，做到“上者尊天事鬼，下者爱利百姓”，人们才会有光明的前景。

可以看到，墨子认为灾害的产生与人为因素有极其密切的关联，即灾害的发生虽说是天意左右，但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世人各种行为不能够“顺天之意”而导致的，故此人为因素才是灾荒出现的真正原因。

2、刑政无道

墨子认为天至大至公，出于这种认识，在治理国家方面，墨子提出“法天”是施政的根本。对此，墨子明确提出，“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？故曰莫若法天。天之行广而无私，其施厚而不德，其明久而不衰，故圣王法之。既以天为法，动作有为必度于天，天之所欲则为之，天所不欲则止。”

墨子认为，如果偏离“法天”的原则，则必然会导致政治混乱，即所谓“有义则治，无义则乱”。墨子看到政治昏闇与财用贫乏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，他明

确指出“有义则富，无义则贫”；“上不听治，则刑政乱；下不从事，则财用不足”。即一旦出现统治昏闇，必将会引起社会失序，进而导致社会财富不足。可以看到，墨子很明确的将政治紊乱、刑错失序看作是“不为天之所欲，而为天之所不欲”的结果，而刑政无道的结局也必然是遭致天意的惩处，导致天下遭遇祸祟，进而引发灾荒。

3、战争影响

墨子生活在战争频仍的春秋战国之际，对于战争的巨大破坏与耗费，他有着深切的认识。故而墨子认为战争是逆天之举，称“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，大家之乱小家也”。对于战争，尤其是兼并战争墨子持坚决反对的态度。

墨子认为严酷的战争是违背天意之举，既然其违背天志，也必将受到上天惩罚。如墨子即称：“今若处大国则攻小国，处大都则伐小都，欲以此求福禄于天，福禄终不得，而祸祟必至矣。”同时从更现实的角度出发，墨子认为战争带来的破坏与靡费也是直接引发灾患频出，灾荒流行的重要原因，如墨子云：“今师徒唯毋兴起，冬行恐寒，夏行恐暑，此不可以冬夏为者也。春则废民耕稼树艺，秋则废民获敛。今唯毋废一时，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，不可胜数。”

对于战争的耗费，墨子还具体分析说：“今尝计军上，竹箭羽旄幄幕，甲盾拔劫，往而靡坏腑烂不反者，不可胜数；又与矛戟戈剑乘车，其往则碎折靡坏而不反者，不可胜数；与其牛马肥而往，瘠而反，往死亡而不反者，不可胜数；与其涂道之修远，粮食辍绝而不继，百姓死者，不可胜数也；与其居处之不安，食饮之不时，饥饱之不节，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，不可胜数；丧师多不可胜数，丧师尽不可胜计，则是鬼神之丧其主后，亦不可胜数。”

可见，墨子认为战争行为既是违背天志之举，导致“祸祟必至”，而且其戕

害生灵，靡费巨大，更是直接带来饥寒冻馁盈野，因此亦为引起灾患的重要因素。

4、惰于从事与礼乐过繁

墨子主张人们应当自食其力，他认为“昔上世之穷民，贪于饮食，惰于从事，是以衣食之财不足，而饥寒冻馁之忧至”。故此，墨子认为当今的人们若“恶恭俭而好简易，贪饮食而惰从事”，其结果也必然就是“衣食之财不足，使身至有饥寒冻馁之忧”。故而，怠惰也是造成灾患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。

此外，墨子主张节用，反对奢侈，对于儒家所推崇的厚葬与礼乐尤为反对，认为厚葬和礼乐过繁也是引起灾患的一个原因。

实际上，墨子早年曾习儒，后弃儒自成一家，其学说对礼乐制度多有指斥。对此《淮南子》即载：“墨子学儒者之业，受孔子之术，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，厚葬靡财而贫民，服伤生而害事，故背周道而用夏政。”墨子弃儒，很重要的原因即是他认为儒家过于注重礼乐制度，徒然靡费财用。墨子曾指出：“姑尝厚措斂乎万民，以为大钟、鸣鼓、琴瑟、竽笙之声，以求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。”他还诘问道：“撞巨钟、击鸣鼓、弹琴瑟、吹竽笙而扬干戚，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？”可见，墨子认为礼乐耗费大量资财，但对于兴利除弊却并无益处。

循着这一思路，墨子认为礼乐过繁而大量浪费财用也是造成灾荒的重要原因。如对于厚葬，墨子曾言：“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，国家必贫，人民必寡。”厚葬的结果也必然导致“下不堪其苦，民见凶饥则亡，此皆备不具之罪也”。

关于“非乐”，墨子态度也很明确，他说：“为乐非也。”对于为乐过繁的危害，墨子指出君子“说乐而听之，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，亶其思虑之智，内治

官府，外收敛关市、山林、泽梁之利，以实仓廩府库，是故仓廩府库不实”。农夫“说乐而听之，即必不能蚤出暮入，耕稼树艺，多聚叔粟，是故叔粟不足”。妇人“说乐而听之，即不必能夙兴夜寐，纺绩织纴，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縿，是故布縿不兴”。从这些言论中不难看到，墨子认为举乐奢靡浪费，诱使人们不务本业，造成社会财用的萎缩而引发灾患。故而，从这一角度出发，墨子否定了乐的正面作用，其“非乐”思想，实际上也是希望把它作为一项根本性的文化政策，长久而全面的加以推行；这与《周礼》中所倡导在灾患时节应“蓄乐”的策略式主张显然有重要的区别。

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，墨子尖锐指出：“儒者以为道教，是贼天下之人者也。且夫繁饰礼乐以淫人，久丧伪哀以谩亲，立命缓贫而高浩居，倍本弃事而安息傲，贪于饮食，惰于作务，陷于饥寒，危于冻馁，无以违之。”可以说，墨子态度鲜明的将礼乐过繁与奢侈怠惰视为了造成灾荒的重要原因。

二、墨子的备荒思想

先秦时期，对于不断发生的灾患，人们在吸收经验教训，不断探究其成因的基础上，已经认识到居安思危，防患于未然，有针对性地预先采取防范措施是减少灾患损失的有效途径。因此，在先秦荒政体系中，备荒思想与实践已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。如《逸周书》即载：“天有四殃，水、旱、饥、荒，其至无时，非务积聚，何以备之？”《国语》也称“有未至而设之”、“可先而不备，谓之怠”；《礼记》亦载：“三年耕，必有一年之食。九年耕，必有三年之食。以三十年之通，虽有凶旱水溢，民无菜色。”从这些备荒方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，这一时期，备荒的重要性已经为人们所认知；保持忧患意识，事先预防以减轻

灾荒，已经是当时荒政思想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特别是强调丰年积聚备荒，在当时的备荒体系中更是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。

关于备荒，墨子从自己对灾荒成因的认识出发，亦有不少论述，在其荒政思想中占有一定的份量。尤其对于备荒的途径与方式，墨子重视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方面手段的阐发和运用，这其中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，颇能体现墨子学说特点。

1、修政与非攻

墨子认为政治昏闇是悖逆天道之举，也是导致上天惩戒，进而引起灾荒的重要原因。从这个角度出发，为避免灾荒，墨子主张修明政治，以顺应天意，避免灾患。如墨子即言：“与接天下之政，治天下之民。此何故始贱卒而贵，始贫卒而富？则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贤使能为政。是以民无饥而不得食，寒而不得衣，劳而不得息，乱而不得治者。”他又说：“今天下之士君子，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，当若有命者之言，不可不强非也。曰：‘命者，暴王所作，穷人所术，非仁者之言也。今之为仁义者，将不可不察而强非者，此也。’”可见，墨子认为，王侯为政如果能做到“顺天之意”即可以“内有以食饥息劳，持养其万民”，从而也有效地达到减少灾患发生的目的。

与修明政事相应的是，墨子也提出非攻、止战是防止灾荒的重要途径。墨子指出战争“春则废民耕稼树艺，秋则废民获敛。今唯毋废一时，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，不可胜数”。因此，对生产、生活破坏巨大。墨子坚持其一贯反对兼并战争的立场，主张“止战”、“非攻”。从反对战争的立场出发，墨子进一步认为只要做到“诸侯之冤不兴矣，边境兵甲不作矣”，即各国间战端不兴，那么就会出现“万民和，国家富，财用足，百姓皆得暖衣饱食，便宁无忧”的安定

局面，从而有效抑制灾患的出现。

2、注重物质生产，避免财用不足

在先秦诸家中，墨子以关注下层民众、重视物质生产而著称。如墨子曾说：“凡五谷者，民之所仰也，君之所以为养也，故民无仰则君无养，民无食则不可事，故食不可不务也，地不可不力也。”墨子认识到了物质生产，特别是农业生产是创造财富的根基，他曾说农夫耕稼树艺“强必富，不强必贫；强必饱，不强必饥”；妇人纺绩织纴“强必富，不强必贫，强必暖，不强必寒”。在这里，墨子就表现出了鲜明的重视物质财富生产的思想。墨子意识到若背离此点，则必有灾患发生，即所谓：“一谷不收谓之谨，二谷不收谓之旱，三谷不收谓之凶，四谷不收谓之馈，五谷不收谓之饥。”因此人们只有努力耕作纺织，才能够做到财用充足，即所谓“固本而用财，则财足”。

墨子不仅注重物质生产，他也主张人们应当自食其力，强调“赖其力者生，不赖其力者不生”。不过应当注意的是，墨子反对不劳而获，但他并不反对社会分工；相反，他认为合理的社会分工，是创造财富，保证社会安定的重要前提，墨子说“农夫蚤出暮入，耕稼树艺，多聚叔粟”，“妇人夙兴夜寐，纺绩织纴，多治麻丝葛绪拊布縿”，固然是“其分事也”，“凡天下群百工，轮车、鞮、匏、陶、冶、梓匠”，也是各自“从事其所能”，而君子“听治”亦如同“贱人从事”一样，可以使得刑政合理，进而保证不会出现财用不足的情况。

3、建立节用的生活方式

“节用”理念是在墨子学说中突出的特色之一。在其备荒思想中，墨子也引入了节用观念，明确肯定了节用与备荒间的关系，特别是强调了统治者“养俭”对备荒的重要作用。如墨子曾云“圣王为政”则“财不费，民德不劳，其

兴利多矣”。墨子还进一步具体说道：“故虽上世之圣王，岂能使五谷常收，而旱水不至哉？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？其力时急，而自养俭也。”可以看到，墨子已经意识到了统治者若能够为政“养俭”，那么即使有水旱之灾，也可能做到无冻饿之民，显然，这是充分肯定了统治者节用对备荒的明显功效。实际上，也正是印证了墨子所言“圣人”节用，则“兴利多矣”的论断。不惟如此，在其学说中，墨子也论及了百姓节用对备荒的意义。墨子曾言：“夫妇节而天地和，风雨节而五谷孰，衣服节而肌肤和。”墨子又说：“故民衣食之财，家足以待旱水凶饥者何也？得其所以自养之情，而不感于外也。故此，墨子才说“是

以其民俭而易治”。由此可见，墨子提倡的“节用”备荒思想，既针对统治阶级，也面对下层民众，其内涵相当广泛，显然这并非仅仅是针对一时危机而发，而是内容较为系统全面的一种生活方式，而其核心可以说是对上古简约的推崇和对周礼繁芜的贬斥。

关于这一点，司马迁即称“墨者亦尚尧舜道，贬抑周政”。明确指出节用思想是“墨子之所长，虽百家弗能废也”。清人孙怡让在评论墨子节用说时也言：“（墨家）以为儒者礼烦扰而不悦，厚葬靡财而贫民，久服伤生而害事，故背周道而用夏政。”可以说，以上二人对墨子节用思想的评述，切中墨家本义，其论可谓精当。

4、建立仓储

先秦时期，建立仓储制度在当时的备荒体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。如《周礼》即载：“县都之委积，以待凶荒。”又载仓人：“掌粟入之藏……有余则藏之。以待凶而颁之。”

对于建仓储以应对凶年灾荒的作用，墨子亦有充分认识，他曾说：“故仓无

备粟，不可以待凶饥。”又言：“且夫食者，圣人之所宝也。故周书曰：‘国无三年之食者，国非其国也；家无三年之食者，子非其子也。’此之谓国备。”应当说，这些言论都较为典型，突出反映了墨子对建立仓储备荒的认识。

关于蓄积备荒，墨子思想中还有很宝贵的一点，即墨子认识到官府建立仓储固然是备荒不可缺少的途径，藏富于民，将财用存储于民众之中也是可取之道，如他曾说：“取蔬，令民家有三年蓄蔬食，以备湛旱、岁不为。”对此，墨子还更具体说道：“常令边县豫种畜芫、芒、乌喙、椒叶，外宅沟井填可塞不可，置此其中。安则示以危，危示以安。”可见，墨子希望以“边县豫种”的方式扩大财富总量，再通过改造“外宅沟井”，存储财用，而这其中显然也包括将部分财用藏于民间，由此亦可窥测墨子明显的民本思想。

三、墨子的救荒思想

在灾害到来之前，未雨绸缪，预先防备，建立备荒体系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遏灾荒发生。然而灾害的出现有其必然性，特别是在科学和生产水平落后的先秦时期，灾害的发生往往很难预知，灾荒的降临也难以完全避免，单纯的备荒体系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因此灾荒一旦发生，为避免更大的损害，即要采取措施设法降低损失，减轻灾害影响，这就是所谓的救荒。先秦时期，救荒思想已经成为这一时期荒政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与同时代的救荒思想相比，墨子对于救荒也有较为系统的阐述。

1、官赈与互助

先秦社会，国君、仕宦群体掌握了最大份额的社会资源，在调用人力、物力方面，他们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。一旦灾荒出现，出于道义上的需求，同

时更重要的是，为了减缓灾患冲击，防止灾荒带来的社会震荡危及统治稳定，国君、仕宦们也就不免需要出面设法救荒，赈济受灾民众。因此这一时期，官赈已经成为较为常见的救荒形态，即在灾害发生时官府要能做到“有至而后救之”，《左传》载“宋公子鲍礼于国人”，宋国曾发生饥荒，他即“竭其粟而贷之”。就是官宦救荒的例证。孟子也强调“凶岁”官赈的重要性，《孟子》曾云“凶年饥岁”若“君之仓廩实，府库充”，有司即应该救荒，否则就是“上慢而残下也”之举。

墨子代表中下层百姓利益，与官府关系虽然较为疏离，但对于官赈态度也较为积极。墨子认为灾害发生时，官府救荒势不可少，他曾说：“贫人食不能自给食者，上食之。”可见，墨子也承认官赈在救荒中的价值，希望其能发挥减轻灾荒的作用。

灾荒发生时，尽管官赈必不可少，但官府救荒的范围与效果也都有一定的局限性。因此在承认官赈作用的同时，墨子从“兼爱”的角度出发，将单向的官赈说发展成为了兼爱思想主导下的互助救荒观念，主张不分贵贱亲疏，世人皆应相互协助以度灾荒。

在互助救荒方面，墨子提出了“有财相分也”的思想。力主荒景时，“有力者疾以助人，有财者勉以分人”，使得“饥者得食，寒者得衣”。墨子指出若是“腐臭余财不以相分”，必然导致“天下之乱也”。墨子提倡广博大爱，主张“兼天下而爱之”，显然，他的这些互助救荒思想正是其“兼爱”理念的具体反映。

2、节俭度荒

墨子一贯倡导节用，在灾害发生时，墨子也将节俭作为减轻灾荒影响的一种手段，主张节俭度荒。如墨子云“禹七年水”、“汤五年旱”，“此其离凶饿甚

矣，然而民不冻饿者何也？其生财密，其用之节也”，即是较为典型的例证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墨子节俭度荒的主张，不仅针对普通人，他也要求国君、官宦在灾荒时亦应采取节俭之道，以共度时艰。墨子即言：“岁谨，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。旱，则损五分之二。凶，则损五分之三。馈，则损五分之四。饥，则尽无禄禀食而已矣。故凶饥存乎国，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五，大夫彻县，士不入学，君朝之衣不革制，诸侯之客，四邻之使，雍食而不盛，彻骖騑，涂不芸，马不食粟，婢妾不衣帛，此告不足之至也。”明确主张凶饥之年，人君仕宦皆应采取“彻鼎食”、“损禄”等举措，以节俭之道应对灾荒。事实上，墨子有此观念并不奇怪，在先秦诸子中，墨子多以浓厚的平等观念示人，墨子提出了“人无幼长贵贱，皆天之臣也”之说即为其中典型。墨子的核心思想“兼爱”实质上即是一种曲折的平等观念，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评论墨家“尊卑无别也”，班固也指出墨家“不知别亲疏”的特征，正表明了这一事实。因此，墨子主张君臣百姓在灾荒时，皆须节俭度荒，可以说这种思想也正是其平等观念的显现。

3、敬天禳弭

先秦时期，鬼神思想影响深远，遭际灾荒，祭祀祈祷以求禳弭灾患是当时普遍的做法。《周礼》在论及荒政策略时就有“索鬼神”之说。《孟子》也称：“周于利者，凶年不能杀。”即是这方面的反映。

对于灾害，墨子首先强调的是尽人事来救荒，但他也认为敬天以禳弭灾荒亦为可行一途。如汤遭遇大旱，“告于上天”，墨子即赞赏道：“汤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然且不惮以身为牺牲，以祠说于上帝鬼神。”即此汤兼也。虽然墨子之所谓兼者，于汤取法焉。可见，灾患发生时，墨子对于祭祀消弭灾患也持积

极襄赞态度。

墨子是有神论者，加之当时的鬼神观念极为普遍，因此其有敬天以禳弭灾患的说辞并不奇怪。不过应当注意的是，墨子“非命”的观念根深地厚，其敬天禳弭思想实则更为强调遵循“天鬼”爱憎行事以此消弭灾荒，而不是专注于祭祀祈祷本身以除灾患。如墨子曾云：“故古者圣王明知天鬼之所福，而辟天鬼之所憎，以求兴天下之利，而除天下之害。”墨子又言：“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，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，当若鬼神之有也，将不可不尊明也，圣王之道也。”可见，墨子在这里已经明确指出，世人欲“除天下之害”，免于“祸祟”的惩罚，尊崇神明是必不可少的，而敬事“天鬼”的最重要途径就是通晓天鬼的“福”、“憎”，并在此基础上“顺天之意”，兴利除弊，如此才能达到“除天下之害”的目的。显然，墨子敬天禳弭灾患的思想，尽管披上了鬼神的外衣，但实质上其落脚点还是在其“非命”学说之上，应当说这也体现了墨子学说的一贯特色。

总之，墨子在论及灾荒成因时，虽不否认有“天”等超自然因素的影响，但其从“天志”说和“非命”思想出发，尤为强调在神明的观照之下，人们行为决定自己的命运，因此墨子认为灾害的产生与人为因素有极其密切的关联，即灾害的发生虽说是天意左右，但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世人各种行为不能够“顺天之意”而导致的。关于备荒，墨子从自己对灾荒成因的认识出发，亦有不少论述，在其荒政思想中占有一定的份量。尤其对于备荒的途径与方式，墨子重视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方面手段的阐发和运用，这其中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而与同时代的救荒思想相比，墨子对于救荒也有较为系统的阐述。特别是将兼爱、平等、非命思想注入其中，而显得尤为令人瞩目。因此可以说，在先

秦思想家中，墨子荒政学说显得较为全面而特色鲜明，对于灾荒成因、备荒策略、救荒举措等方面皆有阐发，其中多有独到之处，其价值颇值得深入挖掘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邓云特.《中国救荒史》.
- [2] (清)阮元 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》.
- [3] (汉)司马迁.《史记》.
- [4] (清)孙怡让 撰《墨子间诂》.
- [5] 何宁 撰《淮南子集释》.
- [6] 黄怀信撰《逸周书汇校集注》.
- [7] 《国语》.
- [8] (汉)班固.《汉书》.